

金开诚著

乞丐丛谈

北京出版社

艺文丛谈

金开诚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1375

北京出版社

1041375

艺文丛谈

Yiwen Congtan

金开诚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27,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900

书号：10071·587 定价：1.65元

前　　言

我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因此过去已经发表的一些拙作大都和讲课答疑有关，也就是说大部分想法总是先在课堂内外对同学们讲，然后对讲稿或说过的意思加工整理而成为文章。由于这种加工在语言表达上变化很大，所以往往已看不出讲话的原貌。

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出一本大致保持讲话原貌的书，书名就叫《艺文讲录》。我为什么有此奢望呢？原来在我走上讲台以前，有位老师曾对我说：“讲课要记住一点，即课是讲给别人听的。”这话很有意义，就是说在讲课中不能把“自我感觉”当作“客观效果”，要时时处处多为听的人着想。所以讲课除了和写文章一样在内容上用力气之外，还应在表达上力求通俗和生动。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还指出：“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不中用的宣传家。”我想，教员虽不完全同于“宣传家”，但也应力求避免“语言无味，象个瘪三”。所以在讲课的语言表达上，我的确作了较为持久的努力。努力的结果，在讲课的通俗性上，总算有一定的成效；至于说到生动有味，那还差得很远很远，可见要想不象瘪三，实在不容易。

但是，就在我把表达比较通俗的讲稿作为论文寄出去发

表时，却已经碰到不少问题。有些文章费了编辑同志许多删改之工，有些则退回来让自己删改。但我拿自己删改的文章与原来的讲稿比比，却发现所谓“论文”除了读起来更加费劲之外，别无其它特点；但它毕竟能够发表。

再从相反的方面来看，也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有一年我回到家乡，临时被拉讲课，但我没带任何讲稿，只得找一篇发表在刊物上的论文来讲；这课从头至尾未与听众发生情绪、意趣的交流，令人极为扫兴。二是拙作《文艺心理学论稿》出版以后，有些读者来信谬赞书中的文字表达，而所赞者往往是保留讲稿特色较多的篇章。

由此我便得出了两个极可能是片面的结论，即我的讲稿是不可能作为论文发表的；而读者（听众）则比较乐于看（听）我的讲稿（原因只在于它较为通俗）。那么，既然“课是讲给别人听的”（文章也是写给别人看的），我为什么不让读者（听众）省点力气，而去将讲稿改成“论文”，装出一副似乎有点“学术性”的样子呢？这就是我想出一本《讲录》的原因。然而这终究是一种奢望，到了真正编集这样一本书时，我又直觉地意识到口语毕竟不能完全成为书面语；况且讲课传布信息又具有“一次性”，为了让同学们听一次就明白，并且能记下来，所以说话不能不噜苏一点，有些地方还要变着法子重复强调；而书面语则可以反复阅读，行文不能不略略注意简练。于是原来的讲稿又被改来改去，同时书名也接受编辑同志的美意而改为《艺文丛谈》。虽然如此，我在编集过程中，仍竭力保留讲稿的一些痕迹；这固然说明我偏见难改，但也的确包含着两种心意：一是仍然希望读者读起来稍微省力，甚至偶有一点趣味；二是供年青的同行们写作讲稿

时参考（如果他们也认为讲课应该通俗一点的话）。

本书各篇从题目上看比较庞杂，但实际内容却可以作出简单的概括，即试图运用文艺心理学和创造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来说明一些实际问题。问题倒未必真正说明了，而全书有一个缺点却极为明显，那就是有些基本论点往往重复出现。造成这个缺点的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学习和思考不够，而任务却很多。学习和思考不够，所以讲不出多少新鲜深刻的论点；任务很多，又不得不一再重复那些并不新鲜深刻的论点，而且每讲一次又都因对象不同而必须对这些论点略加解释。这种情况尤以在谈方法论问题时更为严重。我曾考虑此类讲稿只选一二篇，但因各篇又有一些可以互相补充的内容，所以终于还是选了几篇，以备适应各类读者之所需。

1984年6月9日于北大蔚秀园

目 录

前言	(1)
系统论与文史研究答问	(1)
试论广义的写作	(17)
反映客观与表现主观	(28)
——文艺心理学选讲	
通感与艺术欣赏答问	(49)
从文艺心理学看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经验	(64)
论作为艺术思维经验的屈辞超现实想象	(102)
杜诗想象释例	(118)
漫谈“想诗”	(128)
关于文艺心理学的通信	(136)
文艺创作中的大脑整体活动	(136)
文艺心理学的作用与研究状况	(139)
谈美感的心理内容	(142)
感觉、直觉与审美	(144)
理性心理活动与理性认识	(147)
读古代诗书画论札记	(152)
说“意在笔前”	(159)

一种特殊的想象.....	(164)
书法艺术答问.....	(170)
书法欣赏讲录.....	(184)
试论秦汉简帛的书法艺术.....	(201)
谈谈电影的欣赏与创作.....	(212)
儿童心理与儿童电影的创作.....	(229)

从心理学角度谈谈文学研究.....	(249)
谈谈现在怎样读书.....	(262)
答“读书破多卷，下笔为何难”	(283)
关于论文的写作.....	(289)
能力、志趣、成果与方法.....	(323)

——语文学习漫谈

系统论与文史研究答问

一

“听说你讲过在文史研究中也要注意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这是什么道理？”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出现的新的思维方法论和行为方法论。它的出现不但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应用，而且有使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更快向前发展的趋势。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包括文史研究者在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也不应例外。

“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什么关系呢？它的出现是否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意味着唯物辩证法或多或少已经过时了呢？”

恰恰相反。系统论的出现乃是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的真理性和强大的生命力！透过新的名词来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实质，可以清楚地看到，属于系统范畴的这些新的科学成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是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是唯物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有效运用：系统论要求人们把客观世界看作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这就决定了它在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上的有序性，也就是布局和发展的规律性。信

息论要求人们克服主观主义，反对自我封闭；不但从思想上，而且落实到行为上，来坚持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类大脑不过是外界信息的接收与加工机构，因此必须敏锐地、及时地、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变化发展。控制论要求人们在准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联系与变化的基础上，自觉发挥大脑中心的能动作用，确定作为工作对象的控制系统，研究与该系统有关的信息与控制过程，制订最合理有效的行为方案，有目的地去控制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而这种方案与目的又要受行为后果在质、量和整体效果上的检验，并根据信息反馈作出必要的修正。

综上所说，属于系统范畴的新的思维方法论和行为方法论，在客观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确有很大的一致性。当然，发明或有效地应用了系统论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们却在自然科学的现实发展中，在个人的研究和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与唯物辩证法客观上基本相符的方法论，这就恰恰从一个方面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普遍性！

二

“在文史研究工作中，怎样应用系统论呢？”

主要是借鉴它的原理，或者说吸取它的精神。文史研究的任何项目或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控制系统”；但除了一些资料性、工具性的项目之外，大多数“控制系统”，至少在现在看来，还难以实现“工程化”，更难以实现“自动控制”。但是贯穿在系统范畴的方法论中的科学精神却是任何创造活动都可以吸取的；在文史研究中，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来加以运用；在运用中如果富有创造性，又可以为属于系统范畴的方法论增添新的内容。

在谈到个人的研究工作之前，照理应该先谈谈整个文史研究的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我们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按照各种学科本身的性质与系统、运用系统论进行组织与管理方面，本来是有巨大优越性的，决非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比拟；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发挥这种优越性，在组织与管理上存在种种浪费时效的现象，急需进行改革。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考虑，咱们还是谈谈个人应该怎样学习和研究吧。”

任何个体研究，任何一种学问，都面临着两个系统：一个是个体本身的各种联系所构成的系统，一个是研究对象的各种联系所构成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又是互相联系与制约的，因此实际上又合成了一个主客观统一的大系统。研究者必须着眼于这个主客观统一的大系统来进行“经营管理”，才能取得最多、最好的研究成果。

“主客观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与制约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表现在许多方面。我现在只举两个突出的方面来试作分析：第一是研究对象的选择。大至一门学问，小至一个课题，其选择确定都是主客观联系、制约的结果。在选择过程中，盲目被动，碰到什么便干什么；或强调“自由意志”，想干什么便干什么，是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的，必须根据来自主客观两方面的各种信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作出准确的选择。例如现在有些大学生，因为报考某一系科的时候，没有在分析各种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最佳的选择，因此后来对

所学的东西感到格格不入。这样，在他那个主客观统一的大系统中，主客观之间的联系便不是一种紧密结合、彼此促进的关系，而是彼此矛盾、两败俱伤的关系。这个例子远不能说明在选择问题上主客观统一的全部复杂情况；但不论情况多么复杂，总而言之是要在分析主客观的各种条件因素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最佳的选择，实现有效的统一。

第二是研究工作的进行方式。这方面的主客观联系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客观改造主观，主观改造客观。什么是“客观改造主观”呢？任何一种学问都有它的系统、规律和特点，而研究者的各种主观条件，诸如个性、兴趣、能力特点以至生活习惯等等，未必都与这门学问的研究工作相适应，于是工作的实践就有可能改变研究者的主观特点，使之符合工作的要求。例如以上所说的作了错误选择的大学生，也并非人人都一错到底，而是绝大部分人都在学习和研究的实践中发生了主观方面的变化，逐步实现了相互促进的主客观统一。这就是“客观改造主观”的表现。至于“主观改造客观”，则是指研究者在工作实践中摸清了研究对象的系统、规律和特点，从而自觉形成最佳的能力配置和工作方式，能够得心应手、极为有效地做出各项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一学科的面貌，这就叫“主观改造客观”。

以上只是举了两个较为突出的方面，来说明主客观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与制约，当然是很不全面的。

三

“请再分别说说主客观两个系统的情况。特别是主观方

面，何以也成为一个系统呢？”

要是分析地看，主观方面其实还不止一个系统，而是至少可以举出三个互相联系的小的系统，它们都与个体的研究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是人的一生，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成为一个时间上的系统。如果有人一生是在系统论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较为理想，可以避免大量时效的损失。这样的人事实上也是有的，例如有不少音乐家、画家、表演艺术家都是从小就确定了方向，而后在一生中步步提高，艺术造诣与时俱增。我国古今也有一些文史研究者，由于家学渊源，从小受到薰陶，而后终身都从事文史研究。这些人，如果仅就一生的时间系统上看，其发展过程就是比较合理与有效的。但大多数人一生中往往有许多变化，其学术长进与时间的流驰就不能同步并进，往往互不相应。这种变化大都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在我们探讨之列。但从个体的主观方面来看，也往往有反系统论的行为。例如我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主要从事《楚辞》方面的工作，当时我曾在大量的文集、笔记、杂考等书中寻找有关《楚辞》的材料，找到的材料并不很多，然而却见过许多有关文史、艺术的其它有用资料，但我当时只采用单打一的工作方法，即只抄与《楚辞》有关的材料，其它一概不记不录。等到现在我在文史、艺术的研究中想起那些资料时，却已记忆不清了；如果再把那些书从头翻阅一遍，岂不是大大的浪费了时效？假如在当时我就懂得了系统论，那么工作中就可以多一点预见性、多一点收获了。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系统论，并不是说人的一辈子只能干一种工作，而是强调各项任务应力求环环相

扣，具有内在的联系，而这就必须以预见性为前提。另外我还听说一个例子，有位老先生要研究一部文史古籍，其中有些难点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因此他就想先学学自然科学；为了学习自然科学，他就又从学习外文入手。这个例子假如不是传闻有误，那么这位老先生的治学态度固然是严谨的，但从方法与效果上看却不是最佳的，因为他为追求特定的目标而采用的方法，与他的时间系统是很不相应的。因此，人在早年、中年、晚年应该各有合理而有效的研究计划。

第二是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本职工作、社会活动、衣食住行、养老育幼、体育锻炼、娱乐休息等等，也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充满了矛盾。有的人在本职工作中不大用心尽力，倒是在其它各方面沉湎忘返，这显然难以取得什么成果。也有的人一头扎进本职工作，根本不顾家庭生活的安排和身体健康，这种精神当然是可敬的；但若因此而损害了家庭关系和子女教育，则反过来又会影响本职工作；再若因此而损害了健康，出现早衰早逝的情况，那么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又是大大的浪费了时效。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里只能提出一个原则与一种方法。一个原则说来简单，就是在突出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恰当安排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之互相协调。一种方法做起来就难了，就是要立足于本职工作，而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辐射式有意注意”，也就是时时带着在本职工作中养成的职业敏感去观察万事万物，争取经常出现“有感于物，有悟于心”的情况，把从各方面得来的直接或间接的信息运用到本职工作中去。这自然不是说做任何事情都会找到与本职工作的联系；但对一个时时把本职工作放在心上的人来说，也的确有这种情况：即本职工作因得到来自

其它方面的启示，而有所改进或解决了难题。其中有一部分情况类似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中的“仿生学”，也属于控制论所强调的“模拟法”；也有一部分启示更为间接，是通过了引发联想与想象，才在本职工作中发挥有益的作用。以上所说的这种方法只能为高度忠于本职工作的有心人所运用；假如在八小时之外便再也不想本职工作，甚至搞文艺研究的人在看电影、看小说时都找不到与本职工作有联系的信息，那就不可能在生活系统中实行系统论了。

第三是人的德、智、体成为一个系统。“体”的问题前面已稍稍涉及，道理明显，不再多说。“德”的问题看来不在方法论范围之内，实际上却大有关系；任何科学的方法论若要行之有效，是都要得到意志的支持的，而伟大的毅力产生于伟大的目标，所以进步的理想与纯正的动机是会在研究工作中起很大作用的。尤其是文史的研究，更在内容上和社会效果上与研究者的思想觉悟有联系；而学术道德更直接影响着研究成果的真伪。前一时期我在校园中漫步，多次看到处理犯错误学生的布告，这是很教人痛心的；由此我也切实感到“德”的问题在学术研究的系统论中是很有实质性的有机组成。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智”的问题。人的智能包括各种基本能力，如感受、理解、记忆、联想、想象、思维等，这又成为一个系统。这一系统的正确营运对于研究工作取得成果有最直接的关系。所谓正确营运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 智能的全面发展。在文史研究中，任何成果的取得，都必须全面运用上述各种基本能力。从来没听说有人光靠记忆能力或光靠思维能力就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成果。而

人的各种基本能力都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先天所提供的乃是高度发展的人类大脑，而它只不过是形成各种能力的物质前提。因此在社会实践中让大脑的各种机能受到及时的、全面的锻炼就非常重要。关于这种锻炼，从婴孩生到人类社会中来便已开始；而在正规的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学习中，孔子说的两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叫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要勤学而多思，就必然会使感受、记忆、想象、思维等基本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许多教师以至一些很有成就的人物却蔽于表面现象，违背了他们的“至圣先师”的遗训，片面强调对书本的念与背（甚至是不經理解就背），这就意味着记忆力的畸形发展，而使感受、理解、特别是“创造想象”和“创造思维”的能力长期受到束缚，甚至变得萎缩，而很少创造性。当然多念多背可以积累信息量，锻炼记忆力，这确是学习中的重要一环。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单讲多念多背，在积累信息的同时，要注意提高对信息进行处理的能力。总之要力求智能的全面发展。

“请允许我打断一下。你说‘很有成就的人物’也叫人背书，那岂不说明通过背书也能有所创造、取得成就？”

情况是这样的：许多有成就的人在背书的同时，事实上也进行了想象与思维能力的锻炼；但这种锻炼的重要作用却未为个体充分觉察，于是他在总结学习经验的时候便着重指出了他用过最大力气（甚至吃过很多苦头）的背书，以为只是靠了背书才使他获得成就的；殊不知这乃是片面地总结了经验，并未深挖他在学习过程中的整个意识活动和各种基本能力的营运。过去在文史研究中，比较不注意方法论的科学

探索与总结，因此有些经验传授难免带有朴素性以至直觉性。对于这一类的经验阐述，要注意吸取其合理有效的因素，而避免其片面性。

“请继续讲智能系统中的第二个问题。”

(二)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智能需要全面发展，但由于先天的原因和后天的训练，个体的各种基本能力的发展实际上总是不平衡的，有的人敏于感受，有的人长于记忆，有的人想象活跃，有的人思维精密。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情况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专业方向的选择。为什么有人选学文科、有人选学理科？表面上看是由兴趣决定的，实际上也是因为基本能力发展的不平衡在以往的学习中起了作用，由于能力中长处的发挥，所以在某一方面容易取得成果，成果便促进了兴趣的增长。这个问题暂不多谈。现在要强调的是，就在同一种文史研究工作中，也会由于各人能力发展的不平衡，而分别形成多种最佳的、得心应手的工作方式，从而分别取得不同性质的成果。假如你仔细观察两个优秀学者的文史研究工作，你将发现他们在选题上各有重点，在论文中各有特色；你若再进而注意他们的研究过程，还将发现他们的工作方式与程序组合也是各有特点的。这就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人发挥长处，打出鲜明的风格。

“你在上面讲要全面锻炼，现在又讲要发挥能力中的长处，这岂不矛盾？”

这是不矛盾的。整个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全面发展为体，扬长避短为用”。比如有个人记忆力很强，他当然要充分发挥这一长处，因此总是选择多用记忆的课题，形成以发挥记忆力为特点的工作方式，作出以资料丰富见长的研